

学人关注

观点秀场

编者按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147名女性代表不仅对大会审议的报告表达意见和看法,向大会提交关于新中国发展的议案,也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及女性权益建言献策。不可否认新中国新女性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本文作者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为研究对象,对一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中女代表的发言和提案主题、内容以及发言表现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期对妇女参政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 姬丽萍 董慧鑫

1953年3月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各地选举的基础上,共选出全国人大代表1226名,其中女性代表147名,占总数的11.99%。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147名女性代表不仅对大会审议的报告表达意见和看法,向大会提交关于新中国发展的议案,也针对自己熟悉的领域及女性权益建言献策。本文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为研究对象,对一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中女代表的发言和提案主题、内容以及发言表现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期对妇女参政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由45个选举单位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47名女性代表,覆盖领域全面,包括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个社会职业中的优秀人物和代表性人物,涉及政府工作者、劳动模范代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者、保育工作者以及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和医务工作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女性代表们发表言论、提出议案,虚心谨慎地做好人大代表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的民主性及民主建政的情况。

女代表提案及发言紧扣时代主题

发言聚焦领域广泛。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的发言和提案涉及政治法律、工业交通、农林水利、文教卫生等诸多领域。女代表们的发言和提案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心。钱瑛部长汇报了各级监察机关的工作,她认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各级监察机关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地监督和检查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执行情况。陶淑范代表认为,全体小学教师的任务是为祖国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因此小学教师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教学工作质量。

历次会议发言主题各有侧重。第一届全国人大历次会议的报告各有侧重,第一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是最为重要的报告,代表们的发言也多围绕此展开。郝建秀代表认为,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使妇女和青年受到国家的亲切关怀。“一五计划”是第二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在第二次会议上蔡畅代表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打下基础,实现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有了保证。第四次会议的主题集中在三大改造完成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倡导各族人民加强团结这些方面。第四次会议上农民代表佟玉兰认为,农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提高。

女代表发言身份特点凸显。第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在发言中体现出明显的身份特点,多从自身的视角出发表达感受,提出意见。工人代表朱玖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曲艺界代表袁雪芬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戏曲工作者成为政权的参与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戏曲工作者成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高尚品德的文艺工作者”。工人朱早弟、朱玖提出了建议改善纺织女工福利的提案,该提案由国务院交由劳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办理。

女代表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经过选举产生的女性代表往往也是某一行业和工作领域的从业者,发言内容往往围绕某一行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和目前存在的不足展开,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司法部司长史在发言中汇报了新中国成立五年来的司法工作,她指出司法工作是同国家的政治任务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紧密地结合进行的,推动和保障了各项运动的顺利完成。卫生部长李德全对卫生事业发展作出汇报,认为卫生部门还存在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的问题,以致职业病和多发病还严重影响着工人的健康,影响着生产。

女代表高度关注女性权益

重视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参加领导工作。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妇女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提高了,因此,妇女争取政治地位的要求更加迫切。晋南地方工作干部李辉指出,合作化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加强了妇女的组织性和团结力量。因此,培养妇女干部的问题就成为当前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重要的政策问题。邓颖超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继续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参加领导工作,她认为必须培养和提拔女社员中的积极分子到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岗位,让她们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和提高工作能力。针对妇女担负的教养子女和家务的问题,邓颖超代表提出,应该注意鼓励她们克服困难,坚持工作,让她们能够不断地进步和提高。

建议广泛动员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妇女解放提供了重要保证,广大妇女也能够发挥自身的智慧和力量,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奋斗。工人代表郝建秀谈到,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的水平,积极参加劳动竞赛。蔡畅代表提出,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各个阶层妇女的中心任务就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她认为,妇女必须加倍努力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妇女才能彻底解放。杨之华代表提议全国各行各业的女工应鼓足干劲,以勤俭节约的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奋斗。裔式媚代表在总结小组工作时指出,女工能够很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会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保证在生产技术和思想上获得双丰收。

关注妇女和儿童特殊权益的保护。对妇女儿童特殊权益的保护,始终是妇女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妇女工作者章蕴指出,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对于保护妇女儿童的政策,存在认识不足和执行不力的问题。她建议加强对干部的政策教育,克服封建残余思想,经常地有计划地检查上项政策的执行情况。邓颖超代表认为,要合理安排使用妇女劳动力,根据生产的需要,妇女劳动力的生理特点和从事家务劳动的实际情况,恰当安排妇女劳动力。朱玖、康克清代表建议,依靠机关团体、企业单位和群众自行组织托儿组织,可以更多地参加生产、工作的妇女解决问题,也可以让孩子得到比较合理的教养。

保护妇女劳动力和女性身体健康。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妇女承担着社会劳动、家庭劳动以及照顾儿童的重任,因此,女性的身体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李辉代表在分享太阳村的模范事迹时,分享了卫生队对经期妇女允许请假或者给她们派轻活,对怀孕妇女产前产后规定假期,保证了女社员们出勤率的经验。王淑贞、林巧稚等女代表指出人工流产应看作是采用避孕方法失败后不得已进行的手术,从保护妇女身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医务人员要继续推进避孕工作,对人工流产采取严肃的态度加以对待。在何碧辉、俞毓峰等代表的联合发言中,强调了避孕是实现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措施,并对开展避孕工作提出了建议。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政治参与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代表中国人口半数的女代表在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充分展示了忠实履行代表职责的参政热情和能力,充分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关注和参与,也充分表达了对女性解放和女性权益的深切期盼和渴望。女性代表在会上的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政府开展工作的高度拥护和认同,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更认为党和政府对于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事业已经有了高度关注和支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解放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为主导力量推动的,女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提案也同样表达出,新中国初期妇女的政治认识和组织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新中国初期女性文化水平和参政能力十分有限,女代表的责任意识与参政议政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但不可否认新中国新女性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妇女参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i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蔡畅、全国妇联与新中国妇女运动专题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BZS149)的阶段性成果。

· 阅读提示 ·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基石。但在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心理或行为习惯,无形和无意中仍然在妨碍着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平等。本文作者从当代性别角色的双重标准入手,分析了性别刻板心理问题,并提出了破除性别刻板心理,促进家庭文化建设的可行之道。

■ 姜云飞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基石。但在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心理或行为习惯,无形和无意中仍然在妨碍着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平等。拿男女两性对“家”的感觉为例,家多是女人关注的重点;而男人的关注点通常更偏向公共空间,呈向外拓展的趋势。这种对家庭的认知体现出来的性别差异势必造成心理落差,容易带来家庭关系的矛盾。问题的关键是,当人们先入为主地接受这些传统性别观念时,会以为是由于男女有别天性使然。其实大不然也。

社会性别理论揭示:性别角色就是“附加于男人女人不同的社会地位的期待行为的总和”。它并不是由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养成的。身为男人就得像“男性”——强壮、优势、主动性、理智、责任心,成为养家糊口、发号施令的家长 and 领导者;身为女人就应该成为“女性”——温柔、被动、浪漫、奉献、有依赖性、善解人意,成为好的服从者和孩子的养护者,最终定格为貌似互补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体系,架构起涉及天性一气质一角色分工一资源一社会地位等男女二分、两两相对实则男尊女卑的一整套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制度。

当代性别角色的双重标准

在当代中国社会,对男女的教养和塑造逐渐变得更开放,但在人们心里,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角色规范有时还是单一甚至僵化的,这就容易形成人们头脑层面的平等认知和潜意识心理行为模式之间的落差和冲突而不自知,在一些层面体现出“双重标准”的矛盾:

一方面,在学业志向上,学校和家庭教育都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男女性别差异不大,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在气质化培养上,依然表现出传统意识。同时,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助长了年轻一代的自我中心和依赖心理,以至于独立与依赖、平等与主导等双重标准并存在人们内心,尤其容易表现在婚姻角色期待上:

例如,无论读了多少书,事业上多么优秀,一到婚姻家庭,女人还是要以相夫教子为主,或者即使依旧工作,也会降低或就动机,为家庭牺牲事业,或者以事业为辅,认同男人养家才天经地义;已经能够在外独当一面,却又顽固坚称自己天生柔弱,依靠男人理所应当。在这样的认知中,男人的心理更容易失衡:认为女人是自私的,既要平等强势的权利又以弱者的名义逃避养家责任。但当男性愤愤不平,其实他们也不可避免掉入双重标准的陷阱:既反感要求男人单挑养家大梁、必须提供房子车子彩礼等性别文化陋习,爱慕独立能干的女性,希望女性参与养家,却又私心要她最好能乖乖顺从自己;即使已具备温柔体贴的能力却以“照顾人做家务是妻子分内事”来衡量妻子是否称职或以此逃避参与家务,或做了家务又心怀委屈等矛盾心理。

常见性别刻板心理和角色期待

有关当代人婚姻角色期待中的标准问题,影视剧中有大量的例证。曾经大火电影《前任》系列的最新一集《前任4:英年早婚》将在9月登陆院线,而曾创下国内言情喜剧片最高票房纪录的《前任3》中,电影开场时一段将近3分钟的男女声旁白就十分典型地表现了性别角色的双重标准问题。

男声旁白首先表达的是当代社会男性感受到的压力:感慨女人做

家庭主妇就会被认为是“德淑贤”,而男人做家庭主夫就会被讽“小白脸”,说明男主看到了男女二分对立的性别角色规范对男人造成的“不平等”,而且质疑吵架一定要男人道歉哄的刻板性别套路,显示出男主对性别平等的诉求,但紧接着说“女人是男人争夺的资源”“大部分的爱情掌握在少数拥有面包的男人手中”,这暴露出男主认同男女强弱物化女性的男权底层逻辑,而且从他对外人在外面工作如战场打拼,回到家对热汤和温柔的需要,也可以看出其认同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姻角色期待。其感受到的不平等显然不是来自女性的压迫,而应该是来自男人们被教化认同的性别角色刻板规范。但大部分男人并不自知这个压迫源,反而以为是女人的要求造成了他们的压力。

而在女人这边,女主是都市白领,有自己的事业,显露出一定的性别平等意识,但一涉及婚恋就说女人的青春易逝,只能用那么短最好年华来选相伴一生的男人,因而有如赌博般冒险,可见女主其实也认同了女人是婚恋市场的待估品,这样刻板的女性角色期待,已掉入物化女性的圈套,因而会特别焦虑,遮蔽了女性自我的独立价值和价值,陷入被挑选的弱者下风。

以上通过对男女两个视角的分析让我们警醒:只要男强女弱的传统婚姻角色期待还存在,那么婚姻就会遭遇矛盾和冲突。男女无意识的双重标准的结果就是男人感叹太累女人抱怨太苦,两性被隔在金星和火星之间,找不到沟通的桥梁,积郁出越来越越轨的性别对立戾气在网络上飘荡,影响社会安定。

破除性别刻板心理的可能路径

如何寻找到破除性别刻板心理之道,应该成为推动现代家庭文化建设的其中一个重要议题。

首先,应彻底放弃“男强女弱”的观念,树立真正的平等意识,避免带着性别标签去培养孩子。如将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等被称作“女性化”的气质和坚强、理性、担当等所谓“男性化”气质共同作为人类的优秀品德,渗透在男孩和女孩的培养中;另外,父母可以从小引导男孩女孩参与家务劳动,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并超越男女二分对立的性别角色,培育相对丰满完整的人格。

其次,亲密关系教育和婚前辅导十分必要。应打破传统婚姻角色期待,重塑家庭角色分工可以灵活互换的平等理念,无所谓谁强谁弱,赚钱养家和操持家务都可以男女共同分担,而不涉及性别角色的评判,重要的是,双方的情投意合都能施展。

再次,男女两性应不惧冲突,真实表达,非暴力沟通。世上从来没有完美关系,冲突也是改善关系的契机。当冲突发生时,要真实表达受伤感,而不是攻击责难,逃避回避或隐忍道歉。女性要放下防御式考试试探以及生闷气不吃饭等自伤模式,正面袒露对爱和体贴的需要;男性学习柔性表达,以正向欣赏的眼光看待伴侣和孩子。

最后,男女两性应觉察自我,不被情绪带走,以问题为中心,理性有爱地沟通,促使关系成长。理解自己和对方的心理和习惯模式背后的真实需要,跳出受害者心态,看到对方的行为许多时候只是被文化教养塑造的结果,而非刻意针对,由此可以做到先不生气,然后想办法有效沟通,用行动作出回应和改变。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破除性别刻板心理,促进家庭文化建设

研究视窗

《家庭政策及其政策环境对提升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

作者:王雯 尹红笑

本文基于“家庭政策—政策环境”组态框架,以12个典型国家为案例,采取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家庭政策与政策环境要素对提高生育水平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共识别出四条驱动路径,总结归纳为三种适配模式,即政策环境独立解释的适配模式、由政策环境与单一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共同解释的适配模式以及家庭政策主导的适配模式。通过分析不同驱动路径的实施效果,结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和基础条件,作者建议建立产假、生育假、育儿假有机衔接的时间支持政策;发展多样化的普惠托育服务;推动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儿童活动及亲子活动;构建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提高生育保险水平,提高产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额度;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发展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贯通培养模式。

来源:《人口与经济》

《灵活工作制能否留住照料行业的女护理员》

作者:钟晓慧 李秉勤

已有研究强调劳动报酬过低是老年护理员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女护理员身兼家庭照料和劳动参与双重身份,处于时间贫困状态,仅从经济维度难以充分理解该群体的职业选择。基于2016—2019年对上海和北京两家养老院的调查,本文考察了灵活工作制对护理员择业产生的影响。作者有三个主要发现。首先,中国城市老年护理员严重短缺且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使得雇主愿意在正规工作场所增加工作灵活性从而吸纳中年女护理员。其次,灵活工作制的建立取决于养老院资金和人力等组织资源,资源受限的雇主会运用非正式制度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最后,传统性别角色文化系统和社会保障系统的性别差异化设计阻碍女护理员延长职业生涯,而工作系统灵活性的增加难以抵消结构性阻力。因此,中国城市老年照料行业仍然普遍面临护理员流失的困境。研究表明,解决时间贫困对于吸引和留住护理员非常重要,仅靠经济激励效果有限。本文对降低护理员流失流提出了政策思路。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白晨 整理)

《嵌入的主体性:乡村振兴中女镇长的镜像刻画与性别气质呈现》

作者:郑育琛 陈威竹 范纯莹

镇长作为乡镇一级开展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人,是乡村振兴战略措施最直接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施者。本文作者借助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分析个案小林基于女镇长的身份向度,以身份、关系、情感等多重维度嵌入乡村振兴事业中的具体行动,揭示其主体性嵌入的三重逻辑,可以呈现出镇长这一角色在乡村治理中的性别气质。作者认为,国家要赋权基层女干部,发挥她们上下沟通和外引内引的桥梁作用,激发她们的社会主体性和内生动力,带动乡村本土女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要从制度和文化层面为她们的成长提供机会,提升她们的政治效能感,并为其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